

071032

现代外国政治
学术著作选译

现代资产阶级 理论社会学批判

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现代资产阶级 理论社会学批判

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著
郑杭生 贾春增 张进京 等译

1127-9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КРИТИКА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БУРЖУАЗНОЙ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Й СОЦИОЛОГИИ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ИНСТИТУТ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77Г.

现代资产阶级
理论社会学批判

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著
郑杭生 贾春增 张进京 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北京鼓楼西大街石桥胡同6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 10.5
1981年9月第1版 1981年9月第1次印刷
字数: 238,000 册数: 10,000
统一书号: 3011·159 定价: 1.15元

目 录

绪言 批判地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学理论的一些迫切问题····	1
------------------------------	---

第 一 编

自然主义的和主观主义的流派

第一章 结构-功能方法	19
社会学中功能观念的思想来源及其形成	19
在意识形态上和理论内容上对功能主义的批判	38
第二章 现代进化论	49
进化论观念在资产阶级社会学中的发展	49
是进化还是进步	59
社会-经济的发展问题	70
第三章 符号的相互作用论	78
乔·赫·米德和吉·莫列诺	82
“符号的”方法	93
“戏剧的”方法	100
第四章 现象主义的社会学	111
埃·胡塞尔论“科学危机”及摆脱这一危机的出路	111
阿·舒茨的“理解着的”社会学	119
赫·加芬克尔的民族方法学	149
现象主义社会学的意识形态基础	159
第五章 存在主义的社会学（埃·蒂里阿基	
安的观点）	167
社会现实的本性	168

社会、文化、时间：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	173
社会的变化	180
社会-历史的预测问题	183

第 二 编

“辩 证 的”流 派

第六章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的社会学”	193
“欧洲”时期	196
“美国”时期	205
“西德”时期	220
第七章 乔·古尔维奇的“辩证的”社会学	244
作为社会学共同理论的“辩证的超级经验主义”	246
科学方法的问题。社会学和历史学是关于人的	
科学的“二巨头”	257
社会现实问题	263
第八章 发生的结构论	277
柳·戈里德曼的社会学理论	277
第九章 美国社会学的“辩证化”	310
重新审查社会学的方法论基础的趋向	310
改变对社会现实的性质的观点	314
对社会学知识的伦理学基础的探索	327

绪 言

批判地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学 理论的一些迫切问题

为了进一步提高社会科学在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作用，苏共二十五大的一些决议在向苏联学者提出研究社会主义社会问题的同时，还提出了提高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理论水平的问题。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目的是危害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败坏它们的声誉，并且归根到底是为了替资本主义的存在进行辩护。

苏共二十五大指出，必须提高“社会科学在同反共主义作斗争方面、在批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理论方面、在揭露那些马克思列宁主义观念的伪造者方面的作用”^①。在这些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理论中，各种各样的社会学观点，其中包括理论社会学观点，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

这些观点，由于致力于那些看起来好象失去直接意识形态意义的问题，与直接的社会存在、尖锐的和迫切的社会问题远不相关的问题，就被资产阶级学者拣了起来，用以对抗历史唯物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社会学。历史唯物主义具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莫斯科 1976 年俄文版，第 214 页。

有有效的、积极的、社会改造的目标；与此相反，资产阶级思想家则极力强调自己观点在价值上和意识形态上的中立性、“客观性”、“超阶级性”。诸如此类的论断，正如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早已指出的，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列宁教导说：“判断哲学家，不应当根据他们本人所挂的招牌……，而应当根据他们实际上怎样解决基本的理论问题、他们同什么人携手并进、他们过去和现在用什么教导自己的学生和追随者。”^①

分析一下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对于基本理论问题的解决，就暴露出它的唯心主义的、反辩证法的性质，而从解决基本理论问题中得出的种种政治结论，则（不管与公开宣布的立场有多么不同）是反动的、适合于保持和维护资本主义的关系的。

资产阶级理论家关于自己观点“不偏不倚”的论断，歪曲了社会学知识的实质。社会学知识按其本性来说不能是中立的，因为它是人对于人类社会的知识，它用抽象的概念体系反映着处于具体历史形式之下的人类积极活动的世界，而提出概念体系的理论家本人就是属于这一具体历史的形式。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写道：“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②

资产阶级理论社会学的观点，把科学地理解世界的一些因素，思想上教条主义的一些特点，以及使这些观点的真实社会意义和社会基础模糊起来的主观思辨，十分稀奇古怪地结合在

①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3页。

一起。因此，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任务，不仅仅是要揭露资产阶级理论的意识形态的实质，而且还要把这些理论本身作为应当研究的社会事实来考察，这些事实能够表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特有的感知世界、认识世界的各种各样的形式，而通过这些形式就能阐明那些制约着某种方法论观点、某种理论内容的人类活动形式。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体系中，对资产阶级社会学进行批判，不仅仅起着一种批判的作用，而且起着一种研究的作用，而归根到底是研究的作用，即研究认识的社会性质，考察“认识论的社会方面，这些方面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所要认识的并不是孤立的个人自身，而是处在社会中的个人，是社会”^①。姆·特·约夫丘克写道，可以把这方面的问题总括起来，确定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社会学^②。因此，马克思主义批判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头等任务，是揭示和详尽地说明知识产生和存在的这样一些规律性，这些规律性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演化过程中以及这一制度被反映为各种各样资产阶级社会学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在这一方面所揭示的规律性，使人们有可能弄明白，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历史不是那种相互没有联系的理论体系的汇总，而是一个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演化而发展和完善着的统一的整体。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尽管在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理论体系中也包含有科学性的成分，但它决不是决定性的成分。说明、分析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指出它在理论上科

① 姆·特·约夫丘克：《今日的历史唯物主义：问题和任务》，载论文集《哲学和现时代》，莫斯科1973年俄文版，第100页。

② 同上。

学上的意义，归根到底是由意识形态的利益决定的，如果说不是由理论家个人的意识形态利益，那末就是由整个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利益决定的。因此可以说，任何一个资产阶级理论社会学的体系，尽管能够在某一方面真实反映社会生活的某种因素或某一水平，但是就整个说来，它对社会的看法不过是一种以部分代替整体的看法，是一种以偏概全的看法，即归根结蒂是一种比喻，它不能提供关于对象的客观真实的理解，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引出某一积极的方面、某一倾向，而不能成为社会改造活动的完全适合的根据。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理论体系之所以不科学，正是由于其作为出发点的世界观前提的局限性；而它在某一发展阶段上对自己占优势的理论观点所作的修改，与其说是由于同科学知识的正常进步相关的事实，倒不如说是因为资产阶级社会意识形态的气候发生变化的结果。

资产阶级理论社会学思想的意识形态成分相对于它的科学成分而言起决定作用，这一点只要约略地看一看西方理论社会学的现状，就很清楚了。

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西方社会学展开了对那种奢望扮演一般社会学理论角色的结构功能主义的批判。结构功能主义由于它的保守性，在当时得到许多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的支持。但是，六十年代末已经激化的社会矛盾、尖锐的争吵和冲突的浪潮，改变了五十年代的相对稳定状况，促使社会学家把注意力转向社会变化和社会冲突的问题。社会学中的一般体系的理论，成了这样两种模型的综合：一种是结构功能的平衡模型，另一种是常常用功能术语表达的冲突模型。

这一流派在西方社会学中的发展，承续了传统的实证主义的谱系，它用接近于自然科学方法的概念来解释社会学的对象

——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这些关系和结构被看作是完全不依赖于人、不依赖于人的意图和意向的东西。人们的行为在这里取决于“体系的绝对命令”，后者规定着人们活动的方向并支配着所作的决定的类型。在这些社会体系中人被看作是受社会结构影响的、在某种程度上被动消极的客体。按照这种观点，社会学家的任务被归结为描述这些结构，并最终归结为：通过改变那些决定着人的活动和进程的条件和因素，来控制人。

在一般的体系理论的范围内，关于按照活动者自觉的意图而实现的社会变化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这些观点的拥护者，也象传统的功能主义者一样，把体系说成是独立的、不依赖于现实的生活。甚至在论述体系的预定的变化时，他们一般也不提人或社会集团，尽管后者对达到有社会意义的目标负有责任。代替这些的是使用无人称的“作出决定的单位”之类的概念。而决定的效力却取决于这一决定的实现将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体系在指定条件下最有利地发挥功能。换言之，这种观点的拥护者寻求那些保证体系得出肯定结果的条件，并且即使不去分析某一决定对人们造成的否定的结果，体系的“工作”效力也常常达到。把个性归结为某种品质的鉴定，例如归结为需要、动机或立场，确实使理论模型更简单了，但也使它们的预测的可能性降低了。

这一点，在人们企图用经验的方法去检验上述观点所提出的理论原理时，就变得越来越清楚了。但是最终表明，避开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特点的问题，是不可能的。在这方面，乔·古尔维奇、特·阿多尔诺、赫·舍利斯基、姆·波拉尼以及其他社会学家和哲学科学的代表人物的著作，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这些学者已经被迫从哲学方面去寻找使传统的经验主义的社会学和自然主义的社会体系理论遭到失败的原因。但

是，对传统的自然科学的社会学方法论所作的最尖锐的批判，却来自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反对这样一些西方的社会学家，这些社会学家在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详细订出了收集材料并对材料进行统计加工的方法。“批判的”社会学的拥护者们指出，社会现实按其本质来说是辩证的，必须寻找一种能够反映社会生活这一经常变化的东西的特点的手段。卡·波佩尔和特·阿多尔诺之间的论战（一九六一年），促成了这样的情况，即上述两个流派之间在方法论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突出出来了，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可以认为，这是一种促进比功能主义方法论观念更新观念传播的催化剂。

关于人的行为不是简单的一套对于外部刺激的反应，关于人本身参与对自己行为的刺激物的选择的思想，推动许多社会学家认识到社会行为有赖于意义，而这种意义正是活动者本人赋予局势的某些方面的。为了论证这种观点，资产阶级理论家们转向现象主义的哲学和社会学。

还在六十年代中期，西方就对埃·胡塞尔的著作进一步感到兴趣。在美国则是阿·舒茨的著作引起了社会学家的注意。人们开始尝试把现象主义的哲学原理和方法论原理同其他的理论公式结合在一起：现象学、拼凑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姆·舍列尔和卡·曼海姆的某些思想、存在主义的一些观念都被汇集成为某种统一的东西。这一类著作完全是折中主义的，在它们之中至今还没有一个包含有最后确定下来的关于社会的理论模型。

近来西方社会学受到语义哲学的重大影响。语义方法的制定，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人们逐渐开始联想到，正是在语言的结构中可能找到理解人的活动的意义的关键。许多社会学家都坚持一种观念，似乎社会的领域就是意义的领域，而意义归根

结蒂要在语言之中表现出来，因此，语言应当成为社会学科学的基本对象。目前许多经验主义的研究就用来分析正常情况下的语言，说明语义的相互作用的社会-结构的特点，说明情势的不同方面对每个参加者个人的意义。

对意义领域的注意，不可避免地使这个流派的研究者去探讨知识在人的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而这同样表明，关于社会学对社会和人的意义的问题，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解决这一问题是人们称之为“人道主义流派”的社会学学派的核心观点。这一学派就是批判的社会学法兰克福学派和现象主义哲学的各种不同的变态。

论证社会学知识在社会变化中的作用，这恰恰是非传统流派的西方社会学家的特点。他们从这样的原理出发：社会领域之所以发生变化，是因为人在认识它。换言之，已经认识到的社会规律性已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规律性。认识本身在改变它，为它补充新的成分，使它成为另外的东西。在这种观点的拥护者们看来，这一认识扩大了社会学科学的可能性和课题。他们认为，社会学拥有最好的适合于认识现实的理论的和方法论的手段。这个流派的拥护者从这样的原理——人是社会的创造者，有能力改变社会，但同时人又常常成为自己在某个时候产生的观念的俘虏——出发，提出社会学可以向人指出人自己给自己设置了那些界限；在他们看来，揭示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人在向自由之路上迈出的明确的一步，虽然还不是全部。社会学作为关于人和为了人的科学，应当在人道主义理想的指引下，“寻找缩小限制的道路”。因此，社会学享有某种特殊的科学，即“解放”科学的地位。

但是，只要不忘记在这里社会的领域基本上被看作是意义的领域，从而社会的变化便是一种意义代替另一种意义，便是

价值体系的更换，那末就可以说，这种观点的拥护者仍然继续停留在唯心主义观念的范围内。他们希望，单靠社会学知识的传播本身就能导致社会的变化，而不必在社会存在的物质范围内发生根本的改变，也就是说，他们又返回到资产阶级启蒙学派的立场。由此可见，资产阶级社会学中的“最新学派”至今尚未在理论方面取得显著的进展；它们只是引起新的方法论上的分歧，这些分歧可以确定为“自然科学”学派和“人道主义”学派之间的分歧。

批判地考察社会学的根据，使得资产阶级理论家注意社会学的研究跟意识形态和政治的联系的问题。关于社会学家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公民立场的问题，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所有这些，只有作为西方在六十年代中期特别尖锐起来的政治冲突在社会科学中的反映，才能理解。在这之前，多数社会学家认为，他们的活动是在政治之外的。产生这种幻想是有某些理由的，因为资产阶级理论社会学长时间内成功地保持了一种“学院学科”的外貌。

但是现在，多数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承认自己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联系以及自己活动的政治后果。不仅如此，现在西方许多人还谈到社会学家积极参加社会生活的必要性，尽管这种参加的形式引起了许多争论和讨论。

概括以上所说，可以得出关于资产阶级社会学在当前发展阶段特有的倾向的一系列结论：

第一，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中至今尚无某种统一的、共同的理论方向，这种方向既为局部的研究提供出发的前提，又为解释所获得的材料提供共同的语言。

第二，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内部已经在理论方面和方法论方面出现了某种分化的倾向，可以把这种分化确定为社会学

的实证主义流派同新的更人道主义的社会学家的对立，后者是和法兰克福学派的辩证的和批判的观念相联系的，也是和现象主义哲学的观念相联系的。

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经历着尖锐的危机。这种状况，并不象某些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企图所说的那样，仅仅是这门学科内部的自我发展的结果。它是由深刻的社会原因所决定的，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一般危机在资产阶级社会学范围内的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本身就是对社会学认识进一步发展的阻碍。阶级的对抗、利益截然相反的集团的斗争，决定着必然要提出这样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只适合于统治阶级或它的某些集团达到目的，而不适合整个社会达到目的。在社会学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机关和私人团体财政支持的情况下，这一发展的方向不能不受由谁首先拨给经费的制约。而问题的轻重缓急首先也不决定于社会学家，而决定于谁向他们付款。因此，社会学多半被统治阶级用来作为手中的工具。

资产阶级社会学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间历史地形成的那种联系形式，决定着在这一学科的范围内，对社会领域的说明是唯心主义的或庸俗唯物主义的。这表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危机的全部特点也是为资产阶级社会学所固有的。

上述简略的考察表明，资产阶级社会学已经多种多样、五花八门到何种程度！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们喜欢标榜观点的“多元论”、自己理论的“容忍心”，断言它是客观地、科学地理解社会领域的必要条件。我们已经指出，类似的多元论实际上意味着每一种观点的“局部性”，并导致形而上学地把局部的东西绝对化，而不能在社会生活的现实多样性中把握统一的东西。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任务是使这些多种多样的

观点条理化，以便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完整的、全面的社会理论同一切“局部的”资产阶级理论社会学的观点对立起来，这个任务也就是对上述观点加以分门别类、确定其类型的任务。

近来，在社会学中经常可以看到按照“科学主义——反科学主义”的原则，对各种理论体系进行区分。但是，正如已经指出的，全部资产阶级理论社会学的体系，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另一方面，大概没有任何一个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会坚持“纯粹的”反科学主义的立场。他们全都认为社会学是科学，全都认为“科学性”是社会知识不可分离的特点。在涉及社会科学时，争论仅仅是要不要把科学观点区分为生硬的实证主义和“柔和的”“人道主义”这样两种。“科学主义——反科学主义”的二分法，在哲学、意识形态和日常意识中起着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理论社会学的范围内却是无济于事的。

在这个意义上，第一批“反科学主义者”中的弗·季利泰的例子，就很说明问题。根本反对社会学——这就是季利泰对社会和社会认识的观点的显著特点。季利泰清楚地表明，他要做的不是“净化”社会学，不是使这门科学更准确。他直截了当地否认科学地认识社会的可能性和合法性。同时，他把实证主义和工具主义的社会学家奥·孔德、赫·斯宾塞、普·利利连费利德等等称作自己思想上的敌人；也就是说，他反对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自然主义的形式。假如季利泰有可能了解现代“理解着的社会学”的观点，那么，也许他也会附和后者的口号，并在“真正的”社会学的旗号下同实证主义的社会学作斗争，在科学的“准确性”的旗号下同实证主义者似是而非地所理解的那种科学作斗争。因此，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在理论社会学中的对立总是相对的，也可以说，是“历史的”。

这一对立本身很少用来进行理论社会学体系上的分类。

同样地，按照“科学主义——人本主义”的标准进行分类，即按照极广泛的世界观的特征进行分类，对于研究理论社会学的这样一些体系的总和，也未必是最合适的，这些体系总是具有表达得相当清楚的理论内容的。

上述所说的两个标准，说明被分析的观点的世界观的特征，具有较大的启发价值。但是为了鉴定社会学的理论，应该面向这样一些更富有内容的特征，这些特征与用某一观点去理解社会现实的本性的独特之处有关。

最后，也可以仿效资产阶级社会学家自己在对理论社会学进行各种不同评述中所采用的分类标准。但是，类似的分类既缺乏逻辑的、又缺乏理论的基础。它们把某些理论家归入某个“学派”或“流派”，其根据就是这些理论家自己提出来作为社会生活某种“局部”因素的基本原则的东西；这只会导致理论上的多元论（古代哲学史）的复活，而不会有助于理解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系统的（社会地组织起来的）性质。

问题在于，资产阶级理论社会学发展的历史，是以其主导的理论-方法论观点的不断更替为特点的，而这又直接依赖于资本主义社会体系的特定的状况和时代的一般的意识形态气候。

例如，十九世纪初资产阶级社会学的产生，就与早期资本主义思想家的理性主义的、进步主义的倾向，有极密切的联系。人们在它们的旗帜上写下了“科学与进步”的大字。社会学刚一问世，也即离开母亲——哲学的怀抱，便急忙摆脱思辨的因素，强调自己的经验性、科学性、实证性、此岸性。在资产阶级社会学创始人奥·孔德提出的科学分类中，社会学占有最高的地位不是偶然的，好象是社会学完成了科学的客观对象的

和方法论的统一。

当然，孔德的立场是不彻底的。在他的社会学中，思辨的历史哲学、自发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以及主观唯心主义的倾向等因素相互交错在一起。但是，他对社会学科学性的追求本身，把作为科学的社会学同以前思辨的和宗教神学的体系对立起来的做法，完全反映了早期资本主义思想家关于有可能合理地安排和科学地认识社会领域的幻想。

这些幻想已经被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过程本身所摧毁。社会的不平等代替了等级的不平等。资本主义的压迫取代了封建主义的压迫；而随着资本主义在十九世纪末进入了它的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它的全部矛盾都异乎寻常地激化了。幻想被历史本身破坏了，而它的毁灭又在意识形态中——在哲学、艺术、科学中——引起了非理性主义的思潮；这种思潮在现时不仅没有消失，甚至反而加强了，这是因为引起上述思潮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矛盾没有消失，反而尖锐了。

马克思在自己的早期著作中，后来又在《资本论》中，光辉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体系的非理性的、反人类的本质，那里商品统治着人，劳动者和自己劳动的产品相脱离，国家与自己的居民相疏远，人与人普遍地相疏远，这是因为交往受到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它们以铁的必然性起着作用——的支配。马克思主义认识了这些规律，也就把控制自己的社会存在、改变自己的社会制度的实际工作，也即实践的革命的活动，提到了人类的议事日程上来。

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结论的革命性是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的，因为社会实践的发展要求废除的正是这种意识形态。因此，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是从另外的角度来思考自己的理论前提和方法论前提的危机的。它把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看作